

文化中国行

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2024年11月18日,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唐代五重舍利套函亮相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

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唐代五重舍利套函,有幸走出国门亮相法国,开启一段跨国之旅,恰似一扇文化交流之窗,悄然展现出泾川大云寺及其出土文物在我国唐代历史进程中不可小觑的重要地位,众多的参展文物成为连接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纽带中的璀璨明珠,也让世界通过文物领略甘肃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非凡魅力。

探秘泾川大云寺珍宝

□ 顾海丽

唐代五重舍利套函

泾川,古称涇州,位于丝绸之路要冲,泾河上游,自古便是关中门户。作为跨越陇山进入陕西的关陇战略要塞,以及径直通往西安的必经咽喉要地,同时也是自西出长安奔赴西域的重镇,泾川在甘肃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佛教文化传播西行的漫漫长路上,泾川大云寺久负盛名,它承载着厚重而辉煌的历史,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后,大力推崇佛教,敕令各州建大云寺,泾川大云寺兴建而起,成为当时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据点。从文化角度而言,大云寺见证了唐代独特的政治与宗教文化融合现象,反映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内涵,成为研究唐代文化史、佛教史的重要实物依据。历经岁月沧桑,虽曾遭受破坏与变迁,但凭借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泾川大云寺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依然是人们探寻历史、感悟宗教文化的重要圣地。

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唐五重舍利套函,属国宝级文物,其意义非凡,不仅先后代表中国、甘肃亮相世界各地的展览,更是中国唐代文化的标志性文物之一,彰显着大唐盛世的辉煌气象与深厚底蕴。除此之外,泾川大云寺还出土了几件重要文物,如大云寺地宫内现存的石门框,后期发现的唐代胡人奏乐青玉带跨……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成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文化与人文历史的重要窗口。

1964年10月,泾川水泉寺村民在平整地时,意外发现泾川大云寺舍利套函,当时村民只见有一四方石匣,打开盖子,内有一铜匣,打开铜匣盖,里面又藏着一个银匣,通体饰有花纹,样子像一口小棺材,打开银匣的盖子,内有一金棺,上面用宝石和珍珠镶嵌,工艺十分精美。当时村民十分好奇金棺里面到底装有什么,于是小心翼翼地打开金棺棺盖,发现里面有一枚小琉璃瓶,内装有14粒米粒一般的物质,整套文物由石函、铜匣、银匣和琉璃瓶组成,由小到大套置在一起。拂去千年的尘土,石匣的盖上赫然显现“大周涇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十六个大字,由此可知这是盛唐佛舍利的容器,并且可知这批舍利的拥有者为泾川大云寺。

公元690年,一代女皇武则天登基,随后在全国兴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经》。《大云经》中记载武则天是弥勒转世,这为她稳固皇权提供了重要依据。就在泾川建大云寺时意外发



石函铭文拓片

现了14枚佛祖舍利,武则天非常高兴,认为是祥瑞之兆,于是派工匠制作了金棺、银匣、铜匣与原有的石匣、琉璃瓶组成五重套函重新放入泾川大云寺地宫内供奉。

这14枚佛祖舍利又是从何而来?在石函的四周刻有千字铭文,内容是由唐朝大司马孟洗所撰,在铭文中记载有“爰有古塔遗址,遂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等内容,得知在唐朝之前这里原有古塔遗址舍利,由于铭文中并未提及舍利所埋的寺庙名字,所以无从得知这珍贵的14粒舍利埋藏于什么时期,哪座寺庙。这些未解之谜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挖掘,找到这批舍利出处的论证。

1971年郭沫若先生在鉴定这批文物时指出:“舍利石函,贵在大云寺舍利传世的物证与记载。在出土的舍利石函中有千字铭文的十分罕见,当中的铭文为我们研究中国唐代历史、古代佛教文化中国化演变过程及舍利埋藏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内容,是中国出土舍利文物中记载地点、舍利数量都完全吻合的一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最为精美的金棺也被考古学界称为“最早的金棺”,它是目前考古所见实物中最早用棺制盛装舍利的先例,首次将中原传统的棺制纳入佛教,开辟了用棺制盛装舍利的先河,并成为舍利埋藏标准,为后世所效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按照佛教本来的传统,舍利装在罽坛内,放在舍利塔之顶,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文化棺制葬制及入土为安的影响,就逐渐演变为以棺制盛装舍利,埋藏于塔基之下的地宫。泾川大云寺五重舍利石函文物,既是此地佛教文化底蕴的客观反映,也为舍利埋藏制度与佛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大云寺舍利地宫石门框

吴荪《泾川舍利埋藏再议》一文对唐大云寺舍利地宫石门框描述如下。大云寺地宫仿墓葬形制,由斜坡、甬道、官室等组成,官室安石门。报告中对石门仅有文字介绍,未发表图像资料,在此作一补充。大云寺地宫原有石板封堵石门,现石板不知踪迹。石门框现藏于泾川县博物馆,石门框由青石制作而成,分为门、侧石柱、门槛三部分,门框通高约1.5米、宽1.08米。石门柱下部有榫,与门槛相套。

门楣半圆形,现残缺为两块,残长98厘米、最宽(高)37厘米、厚19厘米。中部阴线刻束腰莲花宝座,莲瓣肥大,莲座上置香炉。炉身为钵形,带盖。盖呈覆盆状,细长的花叶卷起形成镂空状,盖钮上饰宝珠,周围环绕以火焰。香炉下附束腰莲花座,束腰部分装饰宝珠,底座上饰莲瓣莲叶等。其下为覆莲台。莲花宝座两旁各一莲枝伸出,其上置香宝子。宝子圆筒状装饰莲瓣,宝珠形圆钮,平底。筒身中部有两条横线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下均饰几何纹刻画线。香炉上部阴线刻两身相向飞舞的飞天。束双髻,上饰宝珠,面相丰满。上袒,项圈,下着裙,披帛绕肩飘扬于体外。一手持花上举,一手抚于体外。整体姿态修长灵动,大量的云气纹围绕于其间。

门柱长方形,下有短榫。左右两侧门柱正面均线刻力士像,内侧面线刻天王像。右侧门柱长85厘米、宽21厘米、厚20.5厘米,榫长0.03厘米。正面阴线刻力士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垂挂小幡。力士附圆形头光,发髻高束,戴冠,冠饰飘扬。面相长圆,额部刻皱纹,怒目圆睁,眉上挑,高鼻宽翼,大嘴,两腮鼓起,下颌丰满,短须。面部肌肉隆起,颈短。颈戴项圈,飘带垂于双肩,璎珞交叉于胸前,披帛自双肩下垂,横于腹膝前。下着裙,裙带下垂,赤足站立于云朵上。右手戴手镯,抚于胸前,左手五指伸展,似执杖。门柱内侧面阴线刻天王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垂挂小幡。天王附圆形头光,头部不清楚,似戴冠,面型圆润,立眉鼓眼,怒目圆睁,高鼻宽翼,小嘴,两腮鼓起,下颌丰满,颈短,圆鼓腹。上身披铠甲,肩部搭系披巾。两肩披盖披膊,臂上套臂护。腹部有圆形护腹,腰间扎带下垂,腰带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穿护腿,边荷叶形,双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双手戴手镯,右手叉腰,左手抚于胸前,似持物。侧身面向左站立。

左侧门柱长方形,长85厘米、宽21厘米、厚20.5厘米。正面阴线刻力士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垂挂小幡。力士附圆形头光,发髻高束,戴冠,冠饰飘扬。面相长圆,额部刻皱纹,怒目圆睁,眉上挑,高鼻宽翼,大嘴,两腮鼓起,下颌丰满,短须。面部肌肉隆起,颈短。颈戴项圈,飘带垂于双肩,璎珞交叉于胸前,披帛自双肩下垂,横于腹膝前。下着裙,裙带下垂,赤足站立于云朵上。右手戴手镯,抚于胸前,左手五指伸展,似执杖。门柱内侧面阴线刻天王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垂挂小幡。天王附圆形头光,头部不清楚,似戴冠,面型圆润,立眉鼓眼,怒目圆睁,高鼻宽翼,小嘴,两腮鼓起,下颌丰满,颈短,圆鼓腹。上身披铠甲,肩部搭系披巾。两肩披盖披膊。腹部有圆形护腹,腰间扎带下垂,腰带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穿护腿,边荷叶形,双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双手戴手镯,右手叉腰,左手抚于胸前,似持物。侧身面向右站立。

门楣长方形,长108厘米、宽22.5厘米、高28厘米。上线刻忍冬纹。泾川大云寺舍利地宫石门框作为大云寺遗址中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体现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过程。这块地宫石门框,对研究中国古代舍利埋藏制度、唐代建筑、佛教考古等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门框上的飞天与天王造像,形态逼真,线条流畅自然,处处都体现了唐代精湛的雕刻工艺水平。

大云寺唐舍利地宫石门框
泾川县博物馆藏

眉,怒目圆睁,高鼻宽翼,小嘴,两腮鼓起,下颌丰满。颈短。圆鼓腹。身披战袍,外穿两档铠甲,肩部搭系披巾。两肩披盖披膊。腹部有圆形护腹,腰间扎带下垂,腰带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穿护腿,边荷叶形,双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双手戴手镯,持剑于胸前。侧身面向右站立。

唐代的玉带跨,经常雕琢有动物、狮子和花卉等纹饰,纹饰中最有特色的,当数胡人伎乐纹,雕琢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为高鼻大眼的卷发男性胡人形象。内容多为坐姿的人物,多数手持排箫、横笛、笙簧、羯鼓、琵琶、铜钹、笙等各类乐器演奏音乐,少数或和唱或捧物献宝,抑或持囊倒酒,也有持杯饮酒的,内容丰富,形态逼真。胡人奏胡乐的图像反映了唐代西域乐舞的流行,胡人饮酒与献宝的题材,则是唐代开放、包容和繁荣昌盛、万邦来朝的现实反映。

大云寺出土唐胡人奏乐青玉带跨
泾川县博物馆藏

唐胡人奏乐青玉带跨

2020年5月中旬,在泾川县大云寺景区的绿化施工过程中,王村镇刘家沟村村民刘红玉正在劳作,不经意间挖掘出一块人物玉牌。后将玉牌上缴至泾川县博物馆。经甘肃省文物局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此文物被正式命名为“唐胡人奏乐青玉带跨”,这是泾川县大云寺遗址又一重要发现。胡人形象及奏乐主题反映出当时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频繁,大云寺作为文化汇聚力,此玉带跨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与艺术底蕴,见证了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包容。

根据《唐实录》记载:“文武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三跨;四品金带十一跨;五品十跨;六品犀带九跨;七品银带;八品、九品石并八跨;庶人六跨、铜铁带。”由此可知,玉带是古代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对其形制和使用数量以及佩戴的身份均有规定,是王公贵族系在腰间的装饰,带子上带板的质地、数量、纹饰是区别官职高下的标志。这件唐胡人奏乐青玉带跨,为青白玉,是玉带板中的组件之一。长方形,扁薄体。正面以浅浮雕加饰阴线纹雕刻胡人奏乐形象,人物身着小袖胡衫,脚踏软锦靴,盘坐于长方形地毯之上,双手持一乐器,头偏向一侧,纵情奏乐,沉浸其中,构图合理,层次感强。背面平板素面,有牛鼻小孔,可与皮革串系打结,整体玉质细腻,纹饰精美。

唐代的玉带跨,经常雕琢有动物、狮子和花卉等纹饰,纹饰中最有特色的,当数胡人伎乐纹,雕琢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为高鼻大眼的卷发男性胡人形象。内容多为坐姿的人物,多数手持排箫、横笛、笙簧、羯鼓、琵琶、铜钹、笙等各类乐器演奏音乐,少数或和唱或捧物献宝,抑或持囊倒酒,也有持杯饮酒的,内容丰富,形态逼真。胡人奏胡乐的图像反映了唐代西域乐舞的流行,胡人饮酒与献宝的题材,则是唐代开放、包容和繁荣昌盛、万邦来朝的现实反映。

唐玉带跨多采用浅浮雕法雕琢,琢制时用偏刀和铲底技法配合,刀工遒劲,排列密集有序,一丝不苟,在雕刻衣纹和地毯时用最多,这种在带板边缘逐渐减低的雕琢技法,为唐代玉雕所特有。唐代玉雕内容突出并向写实方向发展,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摆脱了汉代程式化、图案化的古朴遗风,在这件大云寺发现的唐胡人奏乐青玉带跨上将唐代玉雕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泾川县大云寺所出土的一件珍贵文物,宛如一把把钥匙,开启了深入了解这座千年古刹的大门,使其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泾川县博物馆)



泾川大云寺五重舍利套函 甘肃省博物馆藏

(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和泾川县博物馆提供)